

汪晖 著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 卷

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王康著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册

第二版

香港与台湾

2004年11月第2版 2005年11月第2次印刷

汪晖 著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上 卷

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本册细目

◎上卷

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 487

第五章 内与外（一）：礼仪中国的观念与帝国 —— 489

第一节 礼仪、法律与经学 —— 489

1. 世界观转变的“内在视野” —— 489
2. 今文经学与乾嘉学术 —— 492
3. 《春秋》在清代经学中的位置 —— 498
4. 孟、荀与今古之辨 —— 505
5. 礼、法与权 —— 510
6. 礼仪、德刑与王朝政治 —— 513

第二节 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法律/制度多元主义 —— 519

1. 宫廷政治，还是合法性问题？ —— 519
2. 蒙元王朝的合法性与公羊学 —— 522
3. 满清王朝与中国王朝的法统 —— 534
4. 长城的象征意义及其历史转化 —— 543
5. 帝国的法律/制度多元主义及其内在矛盾 —— 548

第三节 今文经学与清王朝的合法性问题 —— 551

1. 奉天法祖与“大一统” —— 551
2. “二伯”与“宗文王” —— 559
3. “讥世卿”与王朝政治的内在矛盾 —— 565
4. “别内外”：外部关系的内在化与“中国”概念的再定义 —— 569
5. “大一统”之礼序与夷夏之相对化 —— 573

第四节 大一统与帝国：从礼仪的视野到舆地学的视野 —— 579

1. 大一统、礼仪中国与帝国 —— 579
2. 封爵之虚化、郡县制与无外/有外的帝国 —— 585

- 3. 舆地学的视野与帝国内外关系的转化 —— 590
- 4. 西北规划与“海洋时代” —— 603

第六章 内与外（二）：帝国与民族国家 —— 609

第一节 “海洋时代”及其对内陆关系的重构 —— 609

第二节 作为兵书的《海国图志》与结构性危机 —— 619

- 1. 从东汉回向西汉 —— 619
- 2. 从西北到沿海 —— 624
- 3. 以“守”为攻 —— 630
- 4. 以陆战对海战 —— 632
- 5. 知识、军事与贸易 —— 636

第三节 朝贡体系、中西关系与新夷夏之辨 —— 643

- 1. 以谁为中心：西方，南洋，还是中国朝贡体系？ —— 643
- 2. 南洋内部的中西关系 —— 653
- 3. 世界范围内的夷夏问题 —— 658
- 4. 英国经济或欧洲资本主义崛起的秘密 —— 665
- 5. “合省国”的政治结构与大一统的想像 —— 671
- 6. 历史预见与现代性的逻辑 —— 675

第四节 主权问题：朝贡体系的礼仪关系与国际法 —— 679

- 1. 朝贡、条约与对外关系 —— 679
- 2. 国际法与主权 —— 695
- 3. 《春秋》、《周礼》与国际法 —— 707
- 4. 丁韪良的“古代中国的国际公法” —— 710
- 5. “列国之势”、民族—国家与重建儒学的世界图景 —— 721

第七章 帝国的自我转化与儒学普遍主义 —— 737

第一节 经学诠释学与儒学“万世法” —— 737

第二节 克服国家的大同与向大同过渡的国家 —— 744

第三节 《大同书》的成书年代与早期康有为的公理观 —— 753

第四节 作为世界之治的“大同” —— 765

- 1. 具体的叙述与普遍的叙述 —— 765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

2. 历史的叙述与科学的叙述（种族主义的知识基础） —— 768

3. 帝国之兵书与世界大同之治 —— 772

4. 国家主义与社会主义 —— 777

第五节 经学、孔教与国家 —— 782

1. 大同与国家、皇权与民权 —— 782

2. 《新学伪经考》 —— 793

3. 《孔子改制考》 —— 804

3.1 封建与一统 —— 804

3.2 三统说与孔子之王制 —— 810

3.3 三世说与对皇权中心主义的超越 —— 815

第六节 从帝国到主权国家：“中国”的自我转变 —— 821

【上卷 第二部】

帝国与国家

第五章

内与外(一): 礼仪中国的观念与帝国

中国亦新夷狄也。

——刘逢禄:《秦楚吴进黜中国表序》

第一节 礼仪、法律与经学

1. 世界观转变的“内在视野”

顾炎武考文知音,研讨礼乐、风俗和制度的流变,戴震辟宋归汉,深通名物制度、纠缠于孟荀之间,章学诚揭橥“六经皆史”的命题,对“道器一体”作了创造性的阐释:他们的学术方式各有差别,但都在复古的礼制论、精密的考证方法与“变”、“权”和“自然之势”(通)之间形成张力。这是一种悖论式的方式,一种把复古的正统主义与经世致用的实践取向融而为一的方式。这种思想的局面为乾隆晚期今文经学的异军突起(庄存与转向公羊学是在1780年以后)提供了怎样的思想前提呢?

清代今文经学肇端于乾嘉时代的常州学派,前有庄存与、孔广森,后有刘逢禄、宋翔凤,下接龚自珍、魏源,他们以《春秋公羊传》为中心,以今文的观点遍释群经,并以之回应现实的挑战。庄氏之学不显于当世,庄存与也不是致力于变法改制的政治家,但他开创的清代今文经学传统为刘逢禄所发扬光大,在龚自珍、魏源手中成为观察和评论时事的思想资源,继而又成为晚清变法时代的轰动一时的学术思潮。清代今文经学学者对于礼仪、法律和历史的研究紧密地联系着多民族帝国内部的民族关系、组织社会的基本原则及其内在矛盾、清帝国面临的不断变化的内外关系及其冲突,等等。从清代中期开始,庄存与、刘逢禄、魏源、龚自珍等人不断地在夷夏、内外以及三统、三世等范畴中探讨王朝的合法性问题,并在礼与法的基础上重建关于“中国”的理解。今文经学者在经学的视野内发展出了一系列处理王朝内部与外部关系的礼仪与法律思想,从而为新的历史实践——殖民主义时代条件下的变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和思想视野。在这个意义上,清代中期开始的今文经学运动是一种有关政治合法性的经学研究,一种政治实践的理论,一种适应王朝体制的历史变化而不断完善的历史观和世界观的建构。

为什么今文经学能够在晚清时代成为囊括各种知识和政治理论的基本框架?它的强烈的政治性,它对清代大一统体制的历史基础和伦理条件的持久追问,它对历史变化的敏感及其学术的灵活性,均为此提供了条件。从今文经学的角度出发探讨晚清思想的转变包含了一个方法论问题,即只有从经学内部的视野进行观察,晚清思想的意义及其变化的轨迹才能充分地展现出来。例如,公羊学为近代科学世界观提供了合法性,但它本身却无法提供这一新的宇宙论和世界观。这一历史关系促成了今文经学内部的变化,它必须超越自己的历史限制,转化为一种包容性的理论。近代科学世界观最终突破公羊学的框架成为新的支配性的知识和信仰。又如,公羊学在“内外”观的框架内理解欧洲资本主义的国家扩张及其主权观念,但它对内外关系的处理方式显然与欧洲殖民主义所推行的主权和国际法观念存在着基本的差异。新的知识和制度是通过政治、经济和军事霸权才建立起自己的支配地位的。

那么,这一过程如何改变和解构了今文经学的世界观并促成了它的内在视野的变化呢?如果把主权、民族关系、法律和礼仪问题抽离经学的视野,我们就无法了解清代政治合法性的那些微妙的历史和伦理内含,无法了解新的内外关系是如何替代、重构旧的内外关系,同时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后者所制约。

今文经学的“内在视野”不是一种僵固的视野,它包含这一视野本身的历史变化,包含促成这一变化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冲突与这一视野之间的互动关系。魏源、龚自珍、康有为、梁启超把今文经学用于政治实践和社会批评,他们的贡献并不限于学术方法上对考证学的扬弃。在他们的思想努力下,各种西方知识——政治、哲学、经济、尤其是科学知识——逐渐被纳入公羊学的理论之中,从而公羊学的历史理论与西方政治思想、实证主义的科学宇宙论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世界观。在这个意义上,今文经学的兴起和变化是对复杂的社会及政治问题的回应,它的意义不能简单地从学术史的角度加以观察。我们无法回避这些问题:公羊学与现代历史观、政治理论和法律的关系怎样?作为一种历史理论和法的思想的公羊学为什么需要一套完整的、一元论的宇宙观作为依据?

无论是经世致用,还是以考证的方法论证经书的真伪,都不是今文经学的独创。清初以降,经学内部始终存在着一种透过训诂考证追究制度、礼乐、历史演变的动力。即使在乾嘉时代,戴震、章学诚等人也没有丧失对于社会问题的敏感和经世致用的意趣,他们洞悉乾嘉考证学的困境,进而在乾嘉学术内部展开出了新的方向。在这个意义上,所谓为考证而考证的风气并不能涵盖所有的古文学者。庄、刘之学与戴、章之学产生于同一时代,如果庄、刘之学包含了对于乾嘉时代的社会危机的回应,那么,戴、章之学不是同样如此吗?今文经学不仅是对乾嘉考证学的反动,而且也是对清初学者经世致用的原则(及乾嘉学术内部已经孕育着的变革因素)的呼应;它们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如果我们仅仅在微言大义与训诂考证、经世致用与为学术而学术之间界定今古文的差别,势必陷入纠缠不清的境地。

2. 今文经学与乾嘉学术

关于今古文的主要分歧历来说法不一,其中最早的说法源自《汉书·艺文志》关于文字异同的论述和《汉书·刘歆传》所载鲁恭王“得古文于坏壁之中”的材料,后又衍为《周礼》、《左传》、古文《尚书》等以古文书写的典籍是否为汉代刘歆所伪造的争论。^[1]龚自珍的《大誓答问·总论汉代今文古文名实》即依此立论,在清代影响广泛。今文即汉代通用隶书,古文即先秦文字。今文学派认为这些以古文写成的文本是伪造之书,古文派大致持相反的立场,由此派生出研究经典应该追究微言大义(今文),还是以考古为主的争论。^[2]但这种叙述不足以说明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各自取向的真正含义,因此又有各种区分今古的论述出现,如以是否立于学官、师说的差别、出书之早晚、口说与载籍之异等标准区分今

[1] “壁中书”包括《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和《孝经》。此外,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这是“古文”的根据。参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页747。

[2] 皮锡瑞对今古文的差别及其历史作了如下概括:“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今古文所以分,其先由于文字之异。今文者,今所谓隶书,世所传熹平《石经》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古文者,今所谓籀书,世所传岐阳石鼓及《说文》所载古文是也。隶书,汉世通行,故当时谓之今文;犹今人之于楷书,人人尽识者也。籀书,汉世已不通行,故当时谓之古文;犹今人之于篆、隶,不能人人尽识者也。凡文字必人人尽识,方可以教初学。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皆用古文;然则,孔氏与伏生所藏书,亦必是古文。汉初发藏以授生徒,必改为通行之今文,乃便学者诵习。故汉立博士十四,皆今文家。而当古文未兴之前,未尝别立今文之名。……至刘歆始增置《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左氏春秋》。既立学官,必创说解。后汉卫宏、贾逵、马融又递为增补,以行于世,遂与今文分道扬镳。”(见氏著《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87—88。)关于古文字问题,康有为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毋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秦篆’者也。是时始建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省易,施之于徒隶也。”“其实古无‘籀’、‘篆’、‘隶’之名,但谓之‘文’耳,创名而抑扬之,实自歆始。”《新学伪经考》,《康有为全集》(一),页678,685。

古,等等。乾嘉考证学注重文字考证,并从书写文字的角度对经书的早晚和真伪给出鉴定。与此相反,今文经学注重声音的流传,认为《春秋》言微,如果没有师生口说之传,无法窥其大义。在这个意义上,今文经学相信声音(口传)较之书写(载籍)更能体现圣人的真义。^[3]然而,即使这一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从考证学的角度说,早期经学、尤其是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是清代考证学的经典之作,该书的宗旨是力图通过对声音的考证理解古代经典之文义,进而获取周代风俗和典制的真义。声音在考证学中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从今文学的角度说,今文家虽然重视口说,但未偏废文字考证。康有为说:“《说文》虽有伪窜,而为古今文字之荟萃,学者当识字,不得不读”,建议后学认真对待段、王之文字训诂之学,配以《尔雅》、《广韵》的研究。“《说文》形学也,《尔雅》义学也,《广韵》声学也。皆学者所不可废,为国朝专门之学。”^[4]经学的中心任务在于通过特定的方法恢复为时间与历史、(多余的)修辞和(文字的)脱漏所遮盖的圣王典制、三代风俗、圣人大义,即礼乐之精义。今文经学派与古文经学派在何为儒之正宗(尊周公还是尊孔子)等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分歧,但恰恰是分歧本身突显了二者共享的“正统主义”这一儒学取向。在清代的语境中,有关正统主义的分歧涉及究竟以何者作为正统的根据:族群、地域或者礼仪?

清代今古之学的差别既涉及复杂的学术史问题,也涉及广泛的政治问题。单纯的学术史方法和政治性论述均无法准确地揭示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差别。因此,我们需要在一种广泛的历史和理论视野中说明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关系。考证学在乾嘉学术中居于主流地位,它的严格的方法论和学术规范迫使今文经学在挑战它的权威地位时不得不经常采用考据学的方式。在这个意义上,今文经学与乾嘉考证学的对立关系是在历史的演变中逐渐形成的。在给庄存与的著作所作的序中,董士锡、魏源

[3] 康有为说:“作《春秋》以托王法,其词微,其旨博,故全赖口说”,点出了“口说”与微言大义的关系。《南海师承记》卷二,《康有为全集》(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页498。

[4] 康有为:《南海师承记》,《康有为全集》(二),页445。

不一而同地强调今文经学为“乾隆间经学之巨汇”，〔5〕庄氏“所为真汉学者庶其在是！”〔6〕他们以坚持汉学正统的方式来表达今文经学的挑战态度，反而透露了今文经学的边缘地位。这种情况直至今文经学极盛一时的晚清时代才真正改变。例如，梁启超以微言大义与训诂名物描述今古文的差别，不再关心今文经学是否具有经学的正统地位这样的问题。〔7〕他的看法与古文经学者阮元相似，后者称庄存与“于六经皆能阐抉奥旨，不专为汉宋笺注之学，而独得先圣微言大义于语言文字之外”，〔8〕同样在经学方法的层面谈论今古文的差异。〔9〕

阮元、梁启超一前一后，一古一今，处于各自时代的学术主流之中，他们在今古文学方面取舍不一，但都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今古之别作出清晰的界定和分疏。然而，乾嘉时代的今古文学并不像他们表述的那样壁垒森严。实际的情况是，乾嘉学者兼采各种资源，学术研究中今古文经学之间的交叉关系比比皆是。从今文经学方面看，庄、刘之学包含了考证学的诸多要素。庄存与的《春秋正辞》上承元末明初休宁赵汸之春秋学，发挥《春秋》微言大义，对于董仲舒之《春秋繁露》多有汲取。但在他的学术中，公羊学只占一小部分：《味经斋遗书》兼采汉宋，未辨古今，不守门户，对于《易》、《春秋》、《尚书》、《诗》、《周官》、《四书》等均有所涉及，其

〔5〕 董士锡：《易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6〕 魏源：《武进庄少宗伯遗书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又见《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页238。

〔7〕 梁氏说：庄存与“著《春秋正辞》，刊落训诂名物之末，专求其所谓‘微言大义’者，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与戴段一派所取途径全然不同”的说法是否准确，我在下文再作分析。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66，页75。

〔8〕 阮元：《庄方耕宗伯经说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9〕 阮元晚年对西汉今文经学、特别是《公羊传》有所涉猎，但他的学术贡献主要以郑、许为中心的东汉古文经学研究。他曾为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作序，梳理公羊学的源流；在他主持下，由学海堂筹划、编纂的《皇清经解》（1829）收入了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今文经学家的著作。学海堂的命名是纪念何休，而《皇清经解》的计划也出于刘逢禄的建议。在这个意义上，阮元虽然是一古文家，但他的经学实践与观念已经与今文经学存在密切的联系。

中《周官记》、《周官说》和《毛诗说》等著作基本上属于古文经学的范围。^[10]孔广森的《春秋公羊通义》不本何休,反而以朴学的态度归纳公羊的思想,后世学者说他“长于音韵小学,治经殆非所长”,是公允的说法。庄存与以《周礼》济《公羊》之穷,孔广森以孟子阐公羊之义,都是家法未严的证明。^[11]刘逢禄发挥东汉何休之“三科九旨”,开公羊家注重家法之先河,但这一转向恰恰吻合清代经学重视家法的传统。我们看他“爰推舅氏未竟之志”而著的《尚书今古文集解》,其自述凡例为五,第一条就是正文字、审音训、别句读、详同异,在方法上完全师法乾嘉考证学的路数。^[12]清代今文经学注重经世致用,对于家法并未如乾嘉学者那样严格。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是专论家法的文字,他批评清代学者隆东汉而抑西汉的观点,但并没有简单否定东汉之学,而是以求道的观点统观经学及其家法,试图在历史流变之中找到经世的根据。他说:

西京微言大义之学,坠于东京;东京典章制度之学,绝于隋、唐;
两汉故训声音之学,息于魏、晋,其道果孰隆替哉?且夫文质再世而

[10] 阮元《庄方耕宗伯说经序》评庄氏之学云:“《易》则贯穿群经,虽旁涉天官分野气候,而非如汉、宋诸儒之专衍术数、比附史事也;《春秋》则主《公羊》、董子,虽略采左氏、谷梁氏及宋、元诸儒之说,而非如何劭公所讥倍经任意,反传违戾也;《尚书》则不分今古文文字同异,而剖析疑义,深得夫子序《书》、孟子论世之意;《诗》则详于变雅,发挥大义,多可陈之讲筵;《周官》则博考载籍,有道术之文为之补其亡缺,多可取法致用;乐则谱其声,论其理,可补古《乐经》之缺;《四书说》敷畅本旨,可作考亭诤友,而非如姚江王氏、萧山毛氏之自辟门户,轻肆诋诘也。”阮元:《庄方耕宗伯说经序》,见《味经斋遗书》卷首。

[11] 用杨向奎的话说:“这也可以说是刘歆的传统,他是以今文学派的世家而提倡古文经。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不得已。公羊学在政治上只能是理论方面的发挥,它是一部历史哲学,不是一部政治纲领,它不具备可运用的典章制度,只是空洞议论,因之要借用《周礼》‘以明因监’。”杨向奎:《清代的今文经学》,《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328。

[12] 他自述的凡例为:“一曰:正文字……审其音训、别其句读、详其衍脱、析其同异;……二曰:徵古义……严家法也;三曰:祛门户……四曰:崇正义……五曰:述师说……”刘逢禄:《尚书今古文集解序》,《刘礼部集》卷九,光绪壬辰年延晖承堂刊本,下同。

必复,天道三微而成一著。今日复古之要,由训诂、声音以进于东京典章制度,此齐一变至鲁也;由典章、制度以进于西汉微言大义,贯经术、故事、文章于一,此鲁一变至道也。〔13〕

从训诂、声音到典章、制度,从典章、制度到微言大义,这一“复古”道路把西汉今文经学视为考证学和历史学最终抵达的阶段和目标。魏源以《周礼》、《左传》解证《诗经》,以宋人之说攻驳毛说,在有些经学者看来纯属变乱家法。他的《书古微》上承阎若璩对《古文尚书》、《孔传》的攻击,定《古文尚书》为伪书。上述例证说明,在1886年(光绪十二年)廖平《今古学考》以《王制》、《周礼》判分今古之前,今古文的分别尚未如此明确(廖以《王制》为虞、夏、殷、周四代之制,《周礼》为周代之制);〔14〕在清末康、梁等今文健将与章太炎等古文学者相互攻诋之前,今古门派并不构成清代经学的森严格局。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差异不仅源自学术传承,而且也是清代思想演变的结果。

从考证学方面看,戴震、章学诚对义理的兴趣已如前述,这里不再重复。在他们之前,阎若璩以三十余年的时间研析《尚书》,著《尚书古文疏证》八卷,以繁复的考证断言《尚书》古文二十五篇为伪书。此后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二卷,对于阎氏的研究多所称引,进一步论定郑康成所传之二十四篇,即孔壁真古文,而东晋晚出之二十五篇,与汉书不合,可定为伪书。这些汉学经典在古文经学的范围内开创了疑古的学术风气,为今文经学的疑古思潮提供了学术史的线索。惠栋学术本重汉代讖纬之说,他的归汉也可以看作是今文经学的先导。钱穆论学站在古文一边,但也

〔13〕 魏源:《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叙》,《魏源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6,页152。

〔14〕 关于廖平分今古的时间,历来有不一致的说法。综合各种材料和考证,应以1885至1886为准。参见廖平:《今古学考》,《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成都:巴蜀书社,1989,页35—110。杨向奎曾说:“今文经学虽然给王莽夺取政权以许多帮助,但今文经缺少典章制度,所以王莽也取法《周礼》,于是表彰《周礼》,‘以明因监’。”又说:“《公羊》和《周礼》虽然在经学上分为今古,这只是经学上的问题,实际上两书的思想内容没有根本不同,都有大一统的要求,也都是要在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一统,这样也就必然陷于自相矛盾而无法解脱。”《绎史斋学术文集》,页2,91。

认为今文经学与乾嘉汉学、特别是惠氏之学有着渊源关系。他说,庄存与不屑于考据,又不能如宋儒在语言文字之外求理,因而“徒牵缀古经籍以为说,又往往比附以汉儒之迂怪,故其学乃有苏州惠氏好诞之风而益肆。……”他的侄子庄述祖(葆琛)的《珍执宦从书》“颇究明堂阴阳,亦苏州惠学也”。^[15]庄、刘之学与惠氏之学有着复杂的历史联系。嘉庆五年,刘逢禄举拔贡生入都,曾就张惠言问虞氏《易》、郑氏《三礼》。张惠言治学由惠氏家法出,刘逢禄的《易虞氏五述序》以家法治易,明显受张惠言的影响。

钱穆批评常州诸贤错把意在考古的惠氏之学当作义理之学,用之于经世的实践,遂致“学术、治道同趋渐灭,无救厄运”的结局,但他的前述评论限于学术传承,未能涉及常州学术与顾炎武、戴震、章学诚之间的历史联系。我们不妨追问:惠栋的辟宋归汉、以“兼两”说理,难道没有隐含政治的和历史的观点吗?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把公羊学的兴起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各种书籍、编撰《四库全书》的浩大工程所导致的学术风气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从另一个方面把今文经学视为乾嘉学术的有机部分:

清之有天下百年,开献书之路,招文学之士,以表章六经为首,于是人耻向壁虚造,竞守汉师家法,若元和惠栋氏、武进张惠言氏之于易,歙程易畴氏之于礼,其善学者也。禄束发受经,善董生何氏之书,若合符节……^[16]

在这个意义上,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产生于同一思想氛围之中,吴、皖学术的某些脉络正是常州学派的先声。

[1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582—583。

[16] 刘逢禄:《春秋公羊释例序》,《刘礼部集》卷三,页22—23。